

对年鉴事业转型升级的几点思考

刘 江*

年鉴是以及时、全面、准确地记述年度事物的发展状况为主的资料性工具书,它不仅具有及时存留资料、保存信息的功能,而且具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性和发展趋向的指引性。笔者以曾经十分流行的《中国历史学年鉴》为例,就年鉴的价值和在新的条件下年鉴的转型升级问题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开始编辑出版。当时,历史学界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正处于解放思想、大力发展学术研究的阶段。由于史学研究领域新的成果大量出现,人才辈出,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随着历史学研究的全面发展,为了及时反映历史学研究的最新信息,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了《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卷(次年出版),意在全面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情况。该卷年鉴主要有“特稿”(年度热点问题专论)、“史学研究”(各断代史、专门史的年度研究情况概述)、“历史新书评介”“史学界动态”“考古文物新发现”“现代已故史学家”“书目论文索引”等栏目。该年鉴出版之后,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直到20世纪末,《中国历史学年鉴》基本保证每年编辑出版一卷(直到2000年卷),成为学术界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信息的必备书。

进入21世纪后,由于经费紧张、机构变动、书号短缺等原因,《中国历史学年鉴》2001年卷直到2009年才出版,年鉴遇到了出版瓶颈。2011年,年鉴编辑工作重新启动,组建了新的年鉴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决定将2001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情况综合概述,最终编纂完成了《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年这十年的综合卷。该卷因为同样原因,直到2014年方才出版面世,而自2013年以后年鉴仍按照每年出一卷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中国历史学年鉴》就此沉寂。这样的情况固然令人惋惜,但是也应该正视其背后的原因。

首先,类似年鉴功能的已有出版物,明显强化了其学术信息传播功能,而其他“文摘”类出版物则纷纷创刊,使读者在了解学术动态、学术成果信息的时候,无论在时效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就前者而言,如1958年即已创刊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其历史研究类分“历史学”“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和“考古学”9个专题刊,逐月全文

* 刘江,女,湖南省湘潭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转载新发表的优秀历史学论文和论文索引,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另如《新华文摘》半月刊有“历史”和“论点摘编”的固定栏目、上海社会科学院2003年创刊的《社会科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00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2012年创办的《历史与社会(文摘)》等,这些文摘类杂志都设有固定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信息发布栏目,同样及时、全面地反映了历史学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年鉴无论在时效性还是在内容含量的全面性等方面均无法与之相比,学术成果的转载类和文摘类刊物不仅完全可以取代而且可以超过年鉴的功能。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是网络的发达和新媒体资源的开发。中国知网、中国维普网、万方数据库、爱学术搜索等学术网站,以其海量的收录论文成果数量和强大的搜索查询功能,成为读者了解学术动态、研读最新学术成果、收集学术研究资料的主体平台,而以发布研究成果的微信公众号为主的新媒体资源更是在第一时间便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发布出来,年鉴以往的学术信息传播功能与之相比已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最后,为了宣传自己的权威性以扩大学术影响,一些媒体和研究机构合作,每年组织年度学术研究热点发布活动,如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发布论坛,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学术月刊》编辑部发布的“人文社会科学年度十大学术热点”,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的“中国历史学十大学术热点”,这些活动同样起到了聚拢学术热点、引领学术趋向的作用,而年鉴的同类效应则相形见绌。

那么,在新的形式下,年鉴的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在新的形势下使年鉴尽快适应并发掘年鉴所独具的特点,应该是提升年鉴品质、提高年鉴关注度的当务之急。

以学术类年鉴而言,首先是要提升年鉴的权威性。如上所述,尽管各种转载、文摘、索引、学术网站、学术搜索引擎、微信公众号提供了海量的学术信息,但也造成了令读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情况。学术年鉴如果以一流专家作为撰稿人评价年度学术研究情况,由他们对大量学术信息进行去粗取精的处理,使年鉴真正具有权威性,则可以大大提升自身的学术价值。其次,年鉴需要改变以往仅局限于每年出一本纸质书的状况,需要迎合现代传媒特点而做出改变,如创建年鉴类网站、建立年鉴公众号、召开年鉴发布会等,将推动年鉴事业转型升级做到实处。再次,努力提升年鉴的权威性,扩展年鉴的内容。学术类年鉴尤其应注重捕捉年度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并配合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项政策性要求,反映年度最新的研究动态,使年鉴真正具有“一年之鉴”的功用。最后,动员各方力量,在提升年鉴品质的基础上,使年鉴能够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的业绩评价体系中,使年鉴能够有诸如《新华文摘》、CSSCI核心期刊目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地位,如此则年鉴的发展将会上一个台阶,年鉴事业则大有可为。